



導演水平高低，  
根本不在於是男是女，  
而是情懷。

---

# 我是女導演

---

26個國際獎項 · 10個中國女導演的知性追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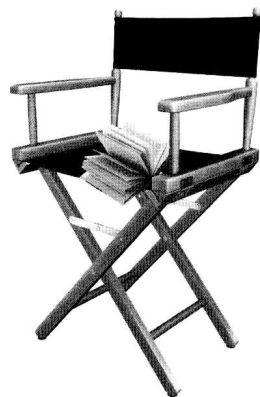
趙靜 著



# 我是女導演

26個國際獎項·10個中國女導演的知性追尋

趙靜 著



千尋出版社

## 我是女導演

---

作 者：趙靜

責任編輯：陳穎賢 蔡耀明

封面設計：黃聖文

版式設計：蔡立國

出 版：千尋出版社

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

<http://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>

發 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印 刷：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6字樓G及H座

版 次：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中文簡體字版©2010山東畫報出版社

中文繁體字版©2010千尋出版社

ISBN 978 962 255 111 4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

本書繁體中文版獲山東畫報出版社授權

千尋出版社出版發行。

## 序一： 裝成男人的時代過去了

許鞍華

最近，我去廣州參加華語傳媒大獎，遇到了兩岸三地十多位新的女導演，趙靜在《我是女導演》中採訪的寧瀛、李玉、馬儷文、尹麗川，也在其中。

這些女導演都有很好的作品，我感覺一個新的時代來了，而本書就是記錄這個時代開端的一幅羣象素描：她們不僅人數多，還很年輕，也很有活力。她們非常自信，女性的身分都很明顯，不僅漂亮，在穿着打扮上也有自己的風格。

這個時代有了很大的進步。以前我們做女導演，一定要裝成男人那樣，穿得很男性化，整天都蓬頭垢面的。那時候覺得，只有這樣武裝起來，別人才會相信你是可以做事的。她們現在很女性化，很自信。

我跟同年代的，或者比我晚些時候出來的女性導演張婉婷、羅卓瑤，都很熟，我們都很認真，從來沒有刻意標榜自己是女導演。

很多時候，大家都會問我對新的女導演或新人有怎樣的期許，我常想，時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，從我自己的經驗裏出發的一些忠告或者經驗，對她們來說，可能已不重要。

我剛出道那時，演員和導演，都會覺得保持神秘感比較好，是拿作品說話，不會經常接受媒體採訪。現在，似乎和媒體的互動越來越多，也不再排斥任何形式的溝通方式。而且，導演的工作方式和分工也已經完全不一樣了，這是由技術帶來的進步。上一輩的導演在技術方面都掌握得很好，也很懂燈光，現在的導演有更多人員協助，反倒要更傾注在劇本寫作上，而不是技術上。

在內地之外，香港新的女導演其實很多，麥婉欣、麥曦茵、黎妙雪、黃真真……在數量上，比十年前多了很多，但大家不會特別強調她們的性

別，也不會拿性別來宣傳，更不會特別介紹她們是女導演。這也是一大進步。

性別對我沒有造成過困擾，但一般來講，女性導演拍戲肯定跟男性導演不一樣。女性看待事情，不會那麼絕對，會正反兩個方面都有所考慮，但在敘述邏輯上不會特別講究，也不會注重傳統的衝突和高潮。

現在這個時代慢慢女性化了，不再專制與暴力，不再一言堂。時代呈現出女性的特點來，我想這其實也是受到了女性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吧。

## 序二： 姐姐妹妹CAMERA

賈樟柯

### 寧瀛姐姐

電影學院四年，每星期看兩部最新國產電影是學生必需的修煉。

某週三的下午，教學樓前照例貼出告示，公告晚上要放的電影片名，其中一部《民警故事》，光片名就讓我歡喜。那陣子我正癡迷默片，白天在課堂上對着電視機，惡補《卑賤的血統》、《十月》之類的沉默經典，晚上有警匪戲看，有了調劑，自然開心。

《民警故事》讓我期待成龍式的飛車打鬥。那時代電影學院還沒有建自己的標準放映廳，看片要到北太平莊的洗印廠禮堂。晚六點前，又是幾百個奇裝異服的文藝青年，如河流般漫在街上，周圍常有人詫異，下了自行車，擔憂地問道：“同學們，怎麼又上街了？”

街上的同學沒時間理會多慮的行人，還要趕路，要在影院燈黑的剎那找到自己的座位。那天我為了配合看警匪片的心情，還特意買了可樂、花生米，準備仰面八叉半躺在座椅上享受觀影的快樂。電影開始了，銀幕上出現了灰灰的冬日北京，在我熟悉的德勝門一帶，幾個警察狂奔而來，追逐一條狗，這狗身手不凡，上竄下跳，穿過護城河，向胡同裏逃逸而去。警察也身手了得，其速度可與狗比，長時間的追逐與奔忙原來只為一條狗命。

這個開頭震撼了我，讓我悄悄把花生米收起，把身體坐直，心裏向導演豎起大拇指：“哥們，你行！”這《民警故事》果然不同《警察故事》，接下來的段落更合我意：新來報到的民警騎着自行車跟着老片警走街串巷，長鏡頭遊走廠橋一帶，京城人情風物，都在眼底。

影片放完記住導演名字：寧瀛。以為是位仁兄。沒想到第二天課堂上，老師談論起昨日電影，竟說寧瀛是位女性，是學校七八班錄音系的同學，中

途輟學遠赴羅馬學藝。在羅馬期間還給安東尼奧尼當過徒弟。安東尼奧尼已是寫進電影史的老人，我還以為他已經過世，沒想到寧姐姐還做過他的助手，頓覺神秘，心裏說道：“姐姐，你行！”

寧瀛還當過貝托魯奇《末代皇帝》的副導演，在我們這行裏副導演往往被看做導演的門生，果然她的電影也盡得意大利電影的真傳。從《找樂》、《民警故事》、《夏日暖洋洋》，到最新的《無窮動》，她不以女導演之名立足，真正自信，有創造力的女權主義者，創作的時候從來不強調自己的女性身分。

同學間漸漸多了她的傳言，一天一位朋友跟我講起，他先後參與過兩個劇組，一個是寧瀛的劇組，另一個是某牛叉導演的劇組。他說跟寧瀛拍戲非常“痛苦”，倒不是工作強度大，而是寧導演經常在現場凝神思考，全劇組都在等她，不知道該向何處去。拍攝的狀態讓人感覺並不是很好，但片子出來卻是傑作。另一位牛叉導演現場拍攝猶如表演，導演的身分被他演的淋漓盡致：時而果斷命令、時而沉着調度，預備開始被他喊得如歌劇般有音韻，但最後看到的卻是一部爛片。

有一張寧瀛的工作照讓我難忘，她在現場，戴一眼鏡在攝影機旁，右手托腮在想事情。周圍無物，她在她的世界中。

《民警故事》這樣的電影不是天天都有，電影學院的日子也平淡起來。倒是同學裏的那些花兒在逐漸綻放。褪去中學生的稚氣，漂白了軍訓時候曬黑的皮膚，表演系的姑娘們個個鮮艷奪目，樓道裏春意盎然起來。那時候電影學院男女生不分層居住，而是以年級混居，於是九三的文學、攝影、錄音、美術、導演、表演各系混居在一個樓道。那些花兒引人奪目，表演系的徐靜蕾當然位列其中。

## 老徐

文學系的體育課被安排和表演系一起上，那時候武俠片已經小有氣候。最新的《方世玉》和《黃飛鴻》剛上映過，張曼玉演的《新龍門客棧》便已經迎面而來。學校為了讓表演系的同學有些武術功底，好適應未來拍片的需要，便從體院找了一個武術教員教他們功夫，這樣我們文學系同學也得跟着踢腿、下腰、蹲馬步。上課時，兩個系的同學稀稀拉拉站成一排，到底



孩子氣，每次剛開始還算有秩序，不一會兒女生們就會把上課內容改為玩狼吃小雞的遊戲。當時徐靜蕾已經有了老徐的雅號。老徐每次都伸開雙臂站在隊前尖叫着抵擋“惡狼”，身後是一長串摔倒在綠地毯上的女同學，喊叫聲在練功房裏迴盪。

老徐更多是安靜的狀態，她的家在北京，每到週末下了最後一節課，在我們趕去食堂打飯的時候，她已經背了包從宿舍出來，一個人穿過空曠的校園，獨自回家。那時候總有一羣男生端了飯碗，在食堂門口眺望她的遠去背影。老徐的背影絕頂端莊，夕陽下如一棵移動的樹，高挑挺拔。

這棵樹週一又會出現在公共課上，在角落裏坐下，低頭看書。每到革命史、法律、外語這類課，同學們要麼趴在桌上睡覺，要麼交頭接耳。老師也自然知道學生們對此了無興趣，便自說自話，互不打攪。但也有特例，我們的法律老師頗喜歡找漂亮女生回答問題，此君每次上課都戴白手套，我們稱之為“太君”。有天“太君”再點羣芳譜，點起了徐靜蕾，喊了幾次她都沒有抬頭，白手套伸手奪過她手裏的書，原來是《張愛玲文集》，似乎正在看《色戒》一篇。老師捧書讀了幾行，說了句讓我們匪夷所思的話：“你們這些表演系的女同學要好好學習法律，萬一將來跟人打官司，也有一點法律知識，不過如果需要，也可以找我來幫你們辯護。”

同學們大笑，笑聲中老徐又開始看她的書。那時候張愛玲還只在文學青年中剛剛開始流行，老徐的閱讀在同學中卻也領了先，讓我刮目相看。日後她做了導演，並不讓我意外。看《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》改自茨威格的小說，我心中說道：“這就是老徐。”老徐絕非一夜成名，這些年她一部一部的演，又一部一部的導，從《我和爸爸》、《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》，到《夢想照進現實》，這一切都來自她日夜不停的苦心修煉。

日子久了，同學間也便多了些對彼此身世的了解。像老徐，都知道她標準文藝青年的前史，自幼練書法，還留墨寶“賽特商場”四個字至今讓人景仰。有一次，一個同學問我：“你知道李虹阿妹嗎？咱們同學，導九三的。”

我答：廢話。

同學：今晚放她哥哥的電影。

我答：她哥哥？



同學：導八七的，剛拍了《談情說愛》。

我答：喔！

同學：你知道她爸嗎？

我搖頭。

同學：導五九的，剛拍了《開天闢地》。

我驚了：那她媽媽剛拍了甚麼？

一屋人笑了。

### 李虹阿妹

因為有上影的投資，2004年我拍完《世界》後帶着片子去上影，放給上影藝術委員的成員看，聽取他們的意見。

《世界》放映完畢，跟這些老導演一一握手，旁邊有人指點，說：“這是李虹的父親。”我便套近乎說李虹阿妹是我的同學，大家一陣哄笑，說：“李虹甚麼時候成了你阿妹了？”我這話不假，李虹是我們九三級全體的阿妹。那時候還沒有美女作家或美女導演這個詞，但李虹的美麗是公認的，她在同學間的明星地位絕不比任何一個表演系同學差，自然也就多了很多追求者。起初，我跟李虹在學校常擦肩而過，只點頭笑笑。但後來，卻常要送情書給她。不要誤解，不是我寫情書給她，是我有一羞澀密友，喜歡李虹，常逼我變成鴻雁，幫他傳情書給李虹。愛是大事，我不敢怠慢。於是要麼中午守候食堂，要麼下午等候在教室，見她來，把信奉，然後說：“這是某某給你的。”她接過信說：“你替我謝謝某某。”

好像臨到畢業，大家才熟悉起來，有時在學校外的大排檔碰到，便拼桌一起，有說有笑。聽說導演系快要拍畢業作品了，她的編劇是我們班的同學郭小櫓，準備開拍一部名為《遠離海岸》的短片。沒過多久，見他們攝製組從浙江漁村回來，李虹曬黑很多，但有了一部讓大家鼓掌稱好的作品。編劇小櫓是女性，後來也當了導演。

97年畢業，九三級散去，各自命運追逐。一大幫同學去了上海，稍一組合，就能成幾個攝製組。遙遠地聽說浦東在大發展，簡單地說，上海有機會。我呢？盲流北京，還在薊門橋一帶混。那年夏天奇熱，我光了膀子，躲在新影廠偷偷剪《小武》。秋天到了，偶爾會遇到去洗印廠看片，潮水般在



街上的師弟師妹，大多人不認識，我抽根煙，注視這些陌生的臉，偷偷想一下自己四年的時光。

第二年，帶《小武》從柏林回來，正逢上海電影節，便攜一盤錄像帶去上海。去看電影，也去看同學。分在上影的同學，住在同一層集體宿舍裏，又好像回到了學生時代。找個錄像機放片子給同學看，李虹也在其中。放映完畢，大家喝啤酒、吃花生，才知道李虹和毛小睿都在準備他們的長片處女作，李虹說是兒童片。兒童片似乎是一條女導演在體制中的老路，片子出來，卻有很多新意。那影片叫《伴你高飛》，其中一幕一隻蝴蝶隨着車廂飛舞，銀幕上全是浪漫和自由。之後，她開始往來京滬兩地，不久拍了《黑白》，以驚悚的類型來表現她的內心。看來她要把驚悚進行到底，接下來是賣座影片《詛咒》。

最近在工體看畫展看到她，她說她基本上常住北京了。這些年，親近的同學也只能在媒體裏了解彼此的行蹤，但這份關注是不會消失的。那天，我們交換信息，談了很多同學的近況。最後，她問我：“小櫓呢？”

## 郭小櫓

小櫓在英國，她是空間上離我們最遠的一個。

畢業那年，她幫李虹寫了《遠離海岸》。《遠離海岸》的男主角是剛從中戲畢業的金琛，小櫓又寫了一個劇本讓他拍，有了《網絡時代的愛情》。那時候，剛有網絡，我還在用朋友幫我攢起來的四八六，小櫓已經有了筆記本電腦。當時，京城臨街的咖啡館不多，如果你在咖啡館曾偶遇一女子，着一襲黑裙，穿一布鞋，抱一筆記本臨窗而坐，奮筆疾書，那人一定是小櫓了。

那時候，她創作力旺盛，那時候，她一年出兩本書。

同學四年，勤奮是她給我最深刻的記憶。每次臨近交作業，我們都到處翻看參考書，或互相抄襲，她卻已經把作業提前交上去，捧一本哲學書來宿舍慰問我們。她的老家在溫嶺，有山有海的地方，那裏的人世代勤勞，毅力頑強。畢業，她分配到廣播學院，就是今天的傳播大學，不久出國去了倫敦，少了她的身影，少了她的消息。

再聽到小櫓的消息，她已經變成了華裔作家。她的小說《戀人版中英詞典》轟動歐洲，常在英語世界的年度圖書獎項提名中看到她的名字。想起

小櫓，總能想起我上學時候的荒唐事：有一次夜深人靜，我飲酒過多，渾身燥熱，於是下得樓來，在校園裏轉了幾圈之後酣然入睡。再醒時，已經是小櫓在旁邊搖我。一睜眼，我睡在學校操場旗杆底下已至半夜，夜歸的小櫓看到我橫臥街頭，以為出了意外，急的直哭。我勸慰她無事，拍拍身上的塵土，向宿舍而去。她尾隨我，以為我有自殺傾向，要問個究竟，還不停寬慰我“船到橋頭自然直”。

如今，同窗共讀的同學相隔太遠。沒想到世界實在太小，2004年，我攜《世界》參加威尼斯影展，在《魂斷威尼斯》的外景地德邦酒店等候記者。突然一襲黑衣出現眼前，連判斷都不用，脫口叫她“小櫓”。小櫓回頭，雖多年不見，還像民國女子，梳倆小辮，瞪眼看我。那年她拍了短片，也來參加影展，於是小櫓由作家又變成了導演。2006年，在鹿特丹影展，她的第一部長片《你的魚今天怎麼樣》得了亞洲影評人獎，頒獎時我在台下，為她鼓掌，不禁眼熱。真是怪了，怎麼也抹不去“同學”二字，四年後不怎麼見面，也不書來信往，甚至背後調侃諷刺，但關鍵時刻，心裏有情，沉甸甸，揮不去。

2006年夏天，漢堡電影資料館辦我的回顧展。一羣人在院子裏喝酒，主辦者告訴我，晚上有中國詩人朗誦，並指着海報讓我看，海報上寫着“xiaolugu”，我拼了下，自語道：“蕭魯國是誰？”我覺得奇怪，我是詩迷，為何不知此君？突然醒悟，啊，應該是 guoxiaolu。晚上，他鄉遇故知，我們竟然在漢堡相見。雖說命運無常，但還是有緣，有緣千里來相會。

都說德國的啤酒好喝，我看咱三里屯的也不差。有一陣，我少年得志，出入國際影展，歸國也出入各種酒吧。夜晚時分，呼朋喚友，與何勇、盛志民結成三人組，在三里屯一帶橫行，東家進西家出，頗過了幾天花花公子生活。屯裏盛傳，最近常出現一美麗女子，剛由法蘭西歸，寫詩喝酒打桌球，人送外號“尹美人”。

## 尹美人

千禧年初，北京頗多藝術活動，文藝青年成羣，感情泛濫，尊重藝術。

有一次，歐陽江河拉我去聽詩會，說是有剛從法國回來的美女詩人主持。那時，我聽了太多詩會，懶得同去，江河卻說，你得認識她，尹麗川，



尹美人。

跟江河去了東城某酒吧，詩會已經開始，老戰士郭路生、林莽紛紛上場，新詩膽西川一旁等候。女主人尹麗川忙裏忙外，兼帶主持。遠遠望去，就覺得她應該是夜不願寐、日不出門的人。詩會結束，大家圍坐飲酒。葡萄酒入肚，卻發現尹美人逐漸臉色光彩照人，猶如澆了水的薔薇，原來這紅酒是她的氧氣，喝了之後情緒漸高，身體茁壯。

尹麗川，北大西語系畢業，法語專業。去法國求學，學的是電影，也偷到了杜拉的風情，左岸的做派。她掌握每一種藝術都不是太難，回國一時拍不了電影，順手寫寫小說便成了小說家，隨意寫幾行詩便成了詩人。在成都、南京、上海，總會聽到有人講，尹麗川剛走，或者尹麗川要來，兼帶江湖上關於她的戀愛故事，似有似無的她要開拍電影的消息。

偶爾也會和她在一起，從一個酒吧到另一個酒吧，從一個詩會到另一個詩會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了無她的消息，我也忙碌起來。有一天在雲南，收到消息，說尹麗川在昆明拍戲，原來她把這段光陰用在了電影上。

第二天，去了公園，看尹麗川拍她的處女作《公園》。尹美人笑臉盈盈指揮着攝製組人員，全然沒了酒吧裏的懶散，變成了幹練的女人。但她依然精心打扮，着裝全然不像拍戲，這是她對女性身分的自愛，當導演的代價不一定是抹殺性別。之後，尹美人又拍了《牛郎織女》，再見她已經是在康城電影展上，她用法語介紹《牛郎織女》，法國觀眾聽她講法語狂喜，掌聲雷動，好像是說，原來講法語，是自己人，但他們不知道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尹美人永遠是三里屯的自由神。

在昆明探班，我站在一旁看她指揮若定，調度演員，聽她喊聲 camera，就會想，是不是講法語的女人都有一個電影夢？我想起了她的師姐唐曉白，也是北大西語系法語畢業，也變成了站在攝影機後的女導演。只是別人不知道，在輩份上，用廣東話，我應該叫她“阿嫂”。

## 曉白阿嫂

2000年拍完《站台》，工作一年的劇組散了。

其中一個副導演留在北京，每天一大早起來，穿戴整齊，待鏡子中的形象自己滿意了，便背着簡歷出去，四處見劇組應聘。晚上在大排檔見他，

問他白天情況如何，他要麼不說話，要麼兩個字：傻逼！

有一天晚上又見他，還沒等我們落座，他便急不可奈的說：“今天，哥們兒見了一個女導演。”

我答：有這麼興奮嗎？

他回：我靠，真正的貴族。

我答：貴族不是都被專政了嗎？

他答：春風吹又生呀！

副導演說的貴族便是唐曉白，初次和她認識是在東城的 FRIDAY 餐廳，那時候上海的一家電影雜誌找人寫我，前來採訪的便是曉白。電話中她報上名來，說正在 FRIDAY，問我能否過來，我也離此地不遠便應約前往。當我們擺動刀叉，就着牛排，暢談塵土飛揚的縣城故事時，我怕她縣城經驗不多，便會多加些解釋。

她淡淡的說：“能懂，我也吃過苦。”

那時候還不知道她的家世，大家初次見面，也拘謹。她只說自己北大畢業，喜歡京劇，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戲，是上學還是上班，我也沒有多問。採訪結束，曉白問我將來稿件出來要不要過目，我裝作瀟灑說：“文字隨你處理，不必過目。”其實潛台詞就是說萍水相逢，不麻煩再見面了。偏是這萍水相逢的開頭，有了成為一家人的結尾。

很長日子過去，一天我正在忙，突然接到電話，對方報上名來，是唐曉白。她從香港打來求助電話，說自己用十六毫米拍了一部電影，但不知道後期該怎樣處置，我才知道曉白真的拍出了長片成了導演。介紹她跟我的香港製片認識，他人在香港，後期熟悉。就這樣，她的首部長片《動詞變位》順利完成了。

這片名就很唐曉白，“動詞變位”是法語的語法概念。當我坐在電視機前，用錄像帶觀看的時候，不由得淚如雨下。往事並不如煙，沉悶的 1990 年，國人都在迎接亞運會，一對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夜晚無處可去，他們騎了自行車穿過曠野般的北京二環，在空曠的公交停車場，在無人看管的車廂裏擁抱，用體溫溫暖對方。這電影和電影中的時代着實讓我難忘。

後來，她和我的兄長結婚，倆人在香港帶孩子，寫劇本，吵架，和解，再吵架，再和解，接着寫劇本，這是他們的完美生活。



她的第二部電影就叫《完美生活》，寫一個東北女孩一步步去了南方，去年威尼斯放映的時候，看《完美生活》又讓我找到看《民警故事》的激動。這電影用了她三年的時間，這年頭拍電影絕非一件浪漫的事，從九十年代開始，先是衛星電視，接着家庭影院，然後是網絡，這些新興媒體都在擠壓電影的空間，協調人際關係，尋找資金，拍出電影，對女導演來說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有一天一個製片人給我打電話，問我願意不願意拍一部手機電影，就是拍了在手機上觀看，開製片會的時候我去了，眾導演中坐着姜麗芬，她是我們九三級表演系的同學，研究院畢業後當了導演。在煙霧繚繞的會議室，在一羣男導演中，她依舊美麗芬芳。

### 姜麗芬，美麗的麗，芬芳的芬

姜麗芬和老徐是同班同學，和我同在一個英語班上課。每個期末英語測試，同學們便盡量坐得靠近她，以她為中心，形成抄襲團隊。在這個班上，她是英文最好的，常受老師表揚。她也樂於助人，每次開考半小時後，她的第一張卷子便沿軸線向教室後面傳，我也得了她的幫助，每次都能過關及格。有一次，到了老師收卷時間，她的第一張卷子還散落“民間”，不知何處，急得她大叫：“誰拿了我的卷子？”一個男生從很遠處答道：“在我這！”

老師愕然，全班同學大笑。

快畢業的時候，姜麗芬演了張鐵林導演的《椅子》，男生們又開始談論九三表演系哪個人會先出來，這是陳年話題，但姜麗芬讓大家意外，表演順風順水的時候，她偏要去讀研究院，去當導演。或許演員這一行真是被動的，需要被人選擇，還是當導演更主動些。她先是畢業留校當了老師，不久便拍了處女作《白色梔子花》，我是有一天在一本電影雜誌上看到了介紹她電影的文章，才知道她也來了個演而優則導。上學四年幾乎天天碰面，卻沒有太多的交談。畢業幾年失去音信，這幾年她是怎麼變成導演的，我沒有問，但從她的作品裏，我知道那些沒有她消息的日子，她一定沒有浪費時間。

在拍手機電影的製片會上碰到她，她說她要拍一個婚禮場面，而且近十分鐘長鏡頭一鏡到底，這種方法相當考驗導演的控制力。攝影機跟演員

的配合，演員走位的準確性，一桌一椅的精確性，都不能出絲毫的紕漏，是意志力極強的導演才能幹的活。姜麗芬自有她的聰明，三天拍攝日她用兩天來排練，果然第三天實拍，一鏡到底一條成功，製片人舒了一口氣，他最怕拍一半重來，如果那樣膠片不知浪費多少。後來看她的完成片，調度的流暢，跟機位的準確讓人佩服。

這佩服二字不是客氣，不是有評論家說我崇拜女性嗎？我覺得我也是女權主義者。天地造物讓人類分為男女，智慧才華其實不分你我。她們是我優秀的同行，電影雌雄同體，不分性別。有緣和她們認識、交往，成為同學、朋友，甚至家人，這只是我的世界，而那些拍電影的花兒們，如今到處開放。

## 那些花兒

無緣認識所有的女性導演，也並非人人都有深交，無法了解她們的全部。○一級的小師妹趙靜有心寫這本書，一字一句聆聽她們的聲音，也幫我開了見識。李玉導演、馬儷文導演、姚樹華導演……她們的電影帝國個個紅顏美麗，看趙靜的書，見字如面。

這本書何止有關電影，更有關這些花兒的風姿綽約。

一定還會有許多女性站在攝影機後面，用她們的眼睛看這個世界。每一次在劇組看到她們喊 camera 的時候，我相信在電影的世界裏，我們沒有性別的差異，我們都是電影的孩子。

## 自序： 榮耀並不遠，正在路上

趙靜

今年美國導演嘉芙蓮碧嘉露 (Kathryn Bigelow) 膺奧斯卡最佳導演獎，是該獎項歷年來首位女性得獎者。她的《拆彈雄心》中幕幕是觸目驚心的“男人戲”，表現出女性視線中的戰爭與槍炮。現實中的她也是一員巾幗女將，叫一眾男性導演如占士金馬倫，也甘拜下風，承認她是實至名歸的。

人們都說，那是荷里活女性出頭天。

那中國的電影世界，何時能開出這片天？

在內地曾有笑談：一個人如果混跡主流體制想獲得提升，所謂的“無知少女”會容易一些——“無”是無黨派人士，“知”是知識分子，“少”是少數民族，“女”是女性。由此可見，女性在官方體制中所受到的優待與重視。

女權運動在中國盛行已久，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，政府推行男女平等，提倡女權主義，以此吸引民眾，推行新型體制。那個時候的文藝作品，比如《小二黑結婚》、《李雙雙》，講的都是女性翻身解放，男女同工同酬，女性獲得自由戀愛權利的故事。這個話題經久不衰，直到八十年代，在一片尋根熱潮中，很多導演拍的都是關於女性處境的影片。第四代導演有黃健中的《良家婦女》，謝飛的《湘女瀟瀟》；第五代導演從陳凱歌的《黃土地》到張藝謀的《菊豆》、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，都講中國女性長期的壓抑、禁錮，人們似乎想從過去中國女性悲慘的境遇裏獲得改革的動力。

也是從八十年代開始，中國女性導演開始以羣體形象登場。一方面，她們的工作開始於文化解禁之後，社會改革之初，另一方面，舊體制尚未終結，她們獲得的拍片機會還要來自國營電影製片廠，因為國營製片廠也要考慮女性政策，因此計劃經濟體制反而留了一些拍片空間給女性導演。

在思想解禁的社會氛圍中，在計劃經濟的保護下，奇怪的合力反而提供給女性作者那個時代的廣闊空間，她們開始拿起導筒，站在攝影機背後。於是我們看到了黃蜀芹的《人鬼情》，李少紅的《血色清晨》和《紅粉》，彭



小蓮的《我和我的同學們》，胡玫的《女兒樓》和《遠離戰勝年代》，劉苗苗的《雜嘴子》……這個時期女性導演的作品，產生於體制，但也沐浴著自由思想。胡玫導演的處女作《女兒樓》以放軍女兵為主要人物，批判的卻是體制對個人的束縛解，這和大鬍子導演陳凱歌的《大閱兵》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拿國營體制的錢拍批評體制的電影，女性導演在機會面前也毫不手軟。

當年李少紅的《紅粉》獲得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，自此中國女性導演開始頻繁進入國際視野。她們中，從意大利學成歸國，曾擔任過貝托魯奇《末代皇帝》助理的寧瀛，她的創作可以看成標誌著女性導演所面對的製片環境的一個轉折。在她回國之初，計劃經濟還佔主導，她的電影生涯也是從體制中開始的。她的處女作是一部商業電影《有人偏偏愛上我》，講一艘遊艇上的愛情故事。雖然是國營製片廠體制下的商業電影，但其中女演員馬曉晴的一段跳舞長鏡頭還是露出了作者的痕跡。

之後，內地開始建立市場經濟，電影工業也在這股潮流的席捲之中。女性導演失去體制庇護，她們開始要面對陌生的市場，並繼續同熟悉的審查戰鬥。寧瀛導演的第二部電影開始與民營公司合作，這家公司是深圳萬科影業，背靠大的房地產公司，拍出的卻是作者電影。她膾炙人口的電影《找樂》、《民警故事》，都是這種模式。寧瀛的出現好像在狂亂而毫無法則的市場經濟暴風雨中，亮出了一道彩虹。離開體制，和民營資本結合，竟然讓藝術更純粹，這其中是甚麼樣的智慧？這種智慧與女性有關嗎？這是我的問題，於是，我想去採訪這些女性導演，了解她們幕後的故事。

從寧瀛到唐曉白，從唐曉白到徐靜蕾……我採訪的這些導演，她們的工作，有的起步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，有的起步於廿一世紀。每一年似乎都有更多的女性導演開始出現，她們拍片的類型，從文藝片綿延到類型電影，從作者電影到商業大片，有的調度上千萬資本，講述古代故事，有的超低預算，像手工作業一樣完成影片，無論何種類型，她們幹得都得心應手。這讓我想起八、九十年代中國的體育，每屆奧運會金牌的總數都依賴娘子軍的發揮。電影也一樣，女性導演巾幗不讓鬚眉，她們的存在同樣讓我們震撼。

我 2001 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，作為女性，一直都非常關心女性導演的工作。我猜這樣因性別而產生的關注，會受到一些女權主義者的批